

『アジア太平洋討究』 No. 16 (May 2011)

中国经济发展与世界金融危机

林 华 生*

Chinese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e Face of the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Lim Hua Sing

China started implementing reform and open-door policies in 1978, and has succeeded in smooth and continuous economic growth for over the last 32 years. China's success was basically based on export-oriented industrialization policies which had attracted abundant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s, technology and managerial know-how not only from Japan and the Western nations but also from Ethnic Chinese enterprises in Asia. Ethnic Chinese enterprises have invested predominantly in landed properties, housing and services sector in China but Singapore tends to invest more and more in constructing industrial parks/estates and new townships in China. These investments can be seen as shaping a new type of Ethnic Chinese investments from Asia to China.

China's rapid economic development has also produced many types of distortions such as the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serious income disparity, the widening gap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bureaucratic and corruptive society etc., These shortcomings are to some extent inevitable but needed timely corrections and adjustments before they become serious political, economic and social problems and spiral out of control in the end.

The world economy has been improved to some extent since the last financial crisis initially erupted in the USA in Autumn 2008. However the overall World economy is still in bad shape. For instance, both the developed and developing countries as well as the emerging economies are experiencing high unemployment rates, the GDP growth rates in most countries have been declining and a protectionist tendency in many countries have emerged since the world-wide financial crisis erupted in the year 2008. Also fiscal deficits in Japan, the USA and Europe have further increased in recent years.

Despite these unfavorable circumstances, China has continued to develop and has become the second largest economic power in the world at the end of 2010. However, China's per capita GDP is only one tenth of Japan and one fifteenth of the USA. China still needs a couple of decades to develop in order to become one of the NIEs and eventually an industrially advanced nation. Nonetheless, China is expected to play a more and more important role in the international arena according to its present national strength. For instance, to shift gradually to become the "world's consumption market" from its present status of the "factory of the world", to continue to be an important buyer of the American national bonds and also appreciating the value of the Renminbi by a larger scale to meet the demand of the Western nations

* 早稲田大学大学院アジア太平洋研究科教授

* Professor, Graduate School of Asia-Pacific Studies, Waseda University.

(一) 中国经济发展的现状和课题

从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到 1978 年的 30 年里,中国基本上实施着中央计划经济。但从 1978 年底开始,中国实施了改革开放政策,并在过去 32 年中一直保持着经济顺利发展。

(1) 中国经济发展和华人资本

中国和世界上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都是通过引进国外的资本,技术,经营理念,使之与国内的较低的劳动力成本和较低的原材料价格相结合,大量生产工业产品,开拓以欧美日为中心的国际市场。可以说中国的经济发展很大程度上是采用了出口导向工业化 (export orientation industrialization/export-oriented industrialization) 政策。

除了欧美日等国的资本,技术,经营理念等因素之外,以亚洲尤其是东盟为中心的东南亚各国的华人企业 (Ethnic Chinese enterprises) 的贡献也不可忽视。自从 1978 年中国开展市场经济 (market economy) 以来,亚洲各国的华人资本 (Ethnic Chinese capital) 始终占引进外资总额的 7 成左右。不考虑华人资本的作用,就无法论述中国的经济发展。这一特点在中国以外的发展国家的发展过程中无法看到。

亚洲华人企业 (Asian Ethnic Chinese enterprises) 的投资曾经集中于中国的经济特区 (special economic zone) 和沿海地区 (coastal area)。投资领域也集中于房地产开发,住宅建设,流通业而不是制造业。但近几年来,尤其是 1999 年中国政府提出西部大开发政策之后,华人资本开始逐渐进军中国内陆地区。此外,近期中国政府制定的最低工资标准和要求提高工资的罢工活动频发,导致生产成本迅速上升。为此,台湾,香港,日本的企业或是把生产地向内陆转移,或是开始准备转移到其他国家。部分的亚洲华人企业也将会逐渐向中国内陆地区转移。在亚洲华人企业的对华投资中,新加坡的情况值得进一步说明。新加坡的口中 78% 是华人,是一个“华人社会”。近几年来,新加坡华人资本的对华投资十分积极,超过了任何一个东南亚国家。其特点是:政府和华人资本联合起来,以“官民一体”的方式积极开展对华投资。新加坡政府资本和华人资本共同在苏州,无锡,沈阳,天津等地建设了“工业园区”和“生态园区”。这是一个包括工厂,银行,医院,学校,邮局,超市,住宅等在内的新型“城市建设”。它的特点是不仅得到了中国中央政府的赞同,并且得到了地方政府的鼎力合作 (资本投入或行政协助)。

新加坡政府似乎希望利用本国的经济建设经验,在中国建设无数个“小新加坡 (工业园区,生态园区)”。尽管“新加坡苏州工业园区”的发展没有如计划所预期的一样顺利,但在吸取其教训的基础上,无锡,沈阳和天津的新加坡政府工业园区计划应当能够顺利发展。

(2) 中国经济发展中的“必要之恶”与“扭曲”

过去 32 年里的中国的经济建设是人类的一项宏大的实验,邓小平所说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摸着石头过河”,“先富论”等等正体现了这一点。

中国在经济上和欧美日一样实施市场经济政策,但在政治上是由共产党基于社会主义理念来治理国家,这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国这种独特的社会主义国家在世界上尚属首次,其经济发展模式能够取得多大的成功值得瞩目。因为当今世界,日本和美国的经济发展模式都已遇到了瓶颈,正在寻求一种新的模式。

“摸着石头过河”意味着试错的过程。中国实行了 30 年的计划经济政策最终碰壁,于是从 1978 年开始实施改革开放政策。从那时开始,中国放弃了自力更生和封闭的经济政策,转而和世界经济挂钩,走上市

市场经济的道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面临了很大的困难。想理解市场经济的特点和机制，并使之在中国运作起来绝非易事。中国通过多次试错和失败，最终实现了平稳的经济发展，这一点是值得刮目相看的。

在当时来看，如果没有足够的勇气和决心，就不可能提出“先富论”。13亿5千万中国人不可能通过市场经济就同时富裕起来。如果产生了贫富差距，就面临着颠覆社会主义社会的风险。中国国民虽然接受了“先富论”，但相信有很多人会产生贫富差距和形成资本主义社会式的阶级社会抱有很大担忧。

过去32年里中国的经济发展，非常引人注目，但不可否认的是，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过程中，“必要之恶”和“扭曲”的现象也发生了。腐败蔓延，政治缺乏透明度，贫富差距拉大，沿海地区和内陆地区发展不均衡，环境污染，拜金主义，房地产泡沫，通货膨胀等等都是此类现象。

因此，对中国经济发展持悲观论调的意见也开始增多。悲观论者只关注中国经济发展的负面因素，预言中国经济必将崩溃。有人说中国的发展将以2008年北京奥运会为尽头，有人说以2010年上海世博会为尽头，总之都认为中国必将衰退甚至崩溃。尤其很多人认为，在2010年10月底上海世博会结束的同时，中国经济将迎来一个停滞期。但事实上，中国经济不仅没有衰退，反而已经成长为能够牵引亚洲乃至整个世界的经济成长的力量。

(3) 如何评价中国的经济实力

2008年中国，日本，美国的GDP（名义）分别为4.3270万亿美元，4.9106万亿美元，14.4410万亿美元。预计在2010年日本会被中国超越，位列世界第二。另一方面，2009年的中，日，美三国的外汇储备分别为2.3991万亿美元，1.494万亿美元和833亿美元。中国已经成为全世界外汇储备最多的国家。但三国的人均GDP分别为5,300美元，33,600美元，45,800美元，中国仍然处于发展中国家的水平。此外，根据联合国的标准，仍然有1亿5千万中国人处于最贫困阶层。中国政府眼下的目标是建设“小康社会”，并期望到21世纪中期成为现代化国家。

由于中国国民接受了“先富论”，中国的贫富差距日益扩大。如果没有政策上或者制度上的措施来阻止这一趋势，就有可能引起社会和政治上的不稳定。现在城市和农村的收入差距为3.3倍，国企高管和普通员工的平均工资差距最大为128倍，富裕阶层和贫困阶层的收入差距达到了23倍。为此，政府提出了建设“和谐社会”的方针，希望通过救济贫困人口（尤其是农民），缓和阶级分化趋势，普及教育和教育平等化的措施来组织资本主义国家式的阶级社会的形成。为了建设和谐社会，如何分配和均衡利用财富将会十分重要。

2008年9月，源于美国的金融危机爆发之后，以G20为中心的国家纷纷出台了以财政支出为主的经济刺激政策。中国出台了到2010年为止投入4万亿人民币（约为当时的60万亿日元）的大型经济刺激政策。德国的这一数字为10.6万亿日元，意大利10.6万亿日元，西班牙9.4万亿日元，法国3.8万亿日元，英国2.9万亿日元。中国的数字超过了上述5国的总和，是一个超大型的经济刺激政策。这一大型的财政支出用于南方雪灾与汶川大地震的重建和救济，社会基础设施（学校，医院，社会福利设施）和工业基础设施（道路，桥梁，发电厂，港口，水库等）的建设，社会福利制度的建设，中小企业的救济等。

源于美国的金融危机发生之后，中国的大型财政支出对国内经济的恢复起到了很大作用。但是，财政支出也通过国内金融机构流进了股市和房地产市场。股票的交易由此变得活跃，房地产的过度投资和投机运

作开始增多。其结果是，本就有泡沫倾向的股票和房地产投资，投机活动再度活跃起来。所幸的是政府已经实施了宏观调控，尤其开始限制房地产的投机活动。现在可以看到股票和房地产泡沫正有平复的趋势。

另一方面，由于世界经济危机，贸易保护主义开始出现。中国的出口贸易也因此受限。因此，如果通过拉动内需扩大国内市场将成为一个重要的课题。中国虽然没有必要，也不可能从“世界工厂”转变为“世界市场”，但提高国民的购买力和生活水平是十分必要的。可以说，中国已经到了利用过去 32 年里积累的财富和荣登全球榜首的 2.4543 万亿美元（截至 2010 年 6 月底）的外汇储备，来改善国民生活水平和社会福利的时期。

（二）世界经济危机的后遗症

源于美国的金融危机爆发，转瞬间就波及了全世界。幸而 G8 和 G20 会议的召开使欧美日等发达国家以及金砖四国和部分发展中国家（印尼等）相继出台了相应的经济政策和经济刺激政策。世界经济危机由此得到缓解。但是，下面四个理由显示，世界范围内的经济状况仍然没有完全恢复。

第一，就业形势恶化，失业率高。日本的失业率为 5.1%（截至 2010 年 8 月），为二战后最高水准。美国为 10% 左右，高失业率的局面一直没有得到改善。根据美国人口调查局的调查，2009 年的生活贫困者比 2008 年增加了 380 万人，达到了历史最高的 4,360 万人。全美国的贫困率也从 2008 年的 13.2% 恶化到 14.3%。每 7 个美国人里就有 1 个是贫困阶层，不同人种之间的差异也非常大。另一方面，欧元区（16 国）的失业率也为 10% 左右。欧元区主要国家的失业率在 2008 到 2009 年分别恶化如下：英国 5.5% → 7.6%，法国 7.8% → 9.5%，德国 7.4% → 8.0%，意大利 6.8% → 9.1%，西班牙 11.3% → 18.2%。西班牙在 2010 年 6 月底的失业率达到了 20.01%，突破了 20% 的关口。即便出台了大型的经济救济和刺激政策，欧美日的经济仍然处于低迷状态，失业率居高不下。国际劳工组织（ILO）于 10 月 1 日发布的 2010 年度世界劳动报告预计，欧美日等发达国家的就业人口要到 2015 年才能恢复到金融危机之前的水平。中国虽然经济发展顺利，景气也在恢复，但失业问题也在日益严峻。

第二，GDP 增长率不仅没有得到改善，反而进一步恶化。金砖四国的增长率比欧美日要好，但也不过是如下水平，与 2008 年相比，2009 年的 GDP 增长率为：巴西 5.0% → -0.6%，俄罗斯 5.6% → -7.5%，印度 7.3% → 5.3%，中国 9.0% → 8.5%。中国和印度有所好转，俄罗斯和巴西仍然陷在泥淖之中。另一方面，欧美日的数据是：欧盟 1.0% → -4.1%，美国 0.4% → -2.7%，日本 -0.7% → -5.3%，都是一片经济低迷的局势，不能不说经济状况仍然非常严峻。

第三，保护主义抬头。源于美国的金融危机发生后，到 2009 年 11 月为止 G20 总共召开了 4 次紧急首脑会议。第 1 次于 2008 年 11 月 14 日在华盛顿，第 2 次于 2009 年 4 月 2 日在伦敦，第 3 次于 9 月 24 日在匹兹堡，第 4 次于 11 月 6 日在圣安德鲁斯。这些会议呼吁与会国家通过经济政策和大型财政支出，来重建本国经济。会上提倡保持国际合作的同时，恢复本国经济，这本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但由于各个国家把恢复本国经济，保护国内市场和企业作为首要课题，保护主义政策开始出现。同时还出现了限制进口，鼓励出口的举措，如美国就提倡“Buy American”。另一方面，国际贸易摩擦也频频发生。如中日，中欧，中美贸易摩擦等。贸易摩擦和保护主义的兴起总是有相关关系或因果关系。以美国为首的各个国家为了创造出就业岗位，实施保护国内产业的政策，限制了进口贸易。后文还会提到，美国通过向中国施加人

人民币汇率上调的压力，来削减中国对美出口。但美国长期以来的国际贸易和财政“双赤字”状况，基本没有得到改善。

第四，财政赤字增大。源于美国的金融危机和世界金融危机爆发后，各国都进行了大量的财政支出。这使财政赤字急剧增加。欧洲主要国家都把财政赤字的基准值（与 GDP 之比）定在 3% 以内，但 2009 年的实际情况是：德国 3.2%，意大利 5.5%，法国 8.2%，西班牙 9.6%，英国 12.6%，欧元区（OECD 13 个成员国的数据）为 6.1%。日本的财政赤字也令人担忧，2010 年度预算的财政赤字与 GDP 之比为 9.3%，之所以金融危机没有在日本爆发，最大的原因是政府发行的国债中，95% 以上都由日本国内购买，没有依赖于“海外资金”。前一段时间，（2010 年 5 月）希腊由于财政赤字增大而导致了金融危机，这一危机波及了欧洲，进而影响了美日。在欧元区的支援（尤其是德国）和美日的合作之下，才阻止了希腊金融危机的进一步扩散。

综上所述，2008 年 9 月发生的源于美国的金融危机和世界金融危机仍然留有高失业率，GDP 增长率恶化，保护主义抬头，高财政赤字等后遗症。

（三） 中国的作用

中国已经在各个领域里（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成为了世界一流的大国。实际上，没有中国参与，就不可能讨论世界大事。

如何理解和评价经济大国，中国是一个非常值得讨论的课题。我想通过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分析中国的实际情况，能够帮助我们客观地理解中国，评估中国的国际作用。中国至少面临着七项任务或课题。

第一是邓小平所说的“韬光养晦”。这是 20 世纪 80 年代起的中国外交战略的重要方针之一。中国不会积蓄实力对外采取强硬姿态。经济利益纠纷力争通过外交渠道，和平解决。领土纠纷也尽可能搁置，为实现共同开发资源而努力。中国仍然应稳步实施改革开放政策，虚心引进外国的资本，技术，经营理念等。取得成果后也应不骄不躁。但近年来随着经济发展，中国的国际地位也在提升，要求中国承担与其国力相符的责任的呼声，开始高涨。

第二是中国能否从“世界工厂”转变为“世界市场”。1978 年以来，世界各国资本纷纷进入中国，把中国作为生产基地，中国成为了“世界工厂”。中国通过促进进出口实现了贸易立国。和印度不同的是，由于没有走拉动内需来振兴国内经济的道路，随着国民收入的增加和源于美国的金融危机爆发后产生的出口下降，中国的内需正在扩大。但中国的人均 GDP 仅为 6,914 美元（截至 2010 年 9 月），离成为“世界市场”，还很遥远。同时，需要不需要实现，还是个富有争论性的问题。

中国的人均 GDP 还处于发展中国家水平。并且不想欧美日一样有跨国企业积极进军海外，进行海外投资。中国的 GNP 也比欧美日要低。欧美日通过政府和民间在海外的投资，每年都能从海外获得巨额利润，也就是说，欧美日通过在世界各地的投资获得收益。不过近几年来，中国政府和民间的对外投资（资源，股票，债券等）也在急剧增加。中国的对外净资产在 2004 年为 29 万亿日元，2007 年就超过了 100 万亿日元，超过了排名第 2 的德国。到了 2009 年，对外净资产达到了 167 万亿日元，为 2004 年的 5.75 倍，正迅速逼近第一名日本的 266 万亿日元（连续 19 年世界第一）。令人感到意外的是，美国的海外投资也一直很多，但同时也接受了海外的巨额投资，因此实际上是对外债务国。

但另一方面，中国国内的产业结构完全是另一种局面。中国是一个农业国家，解决三农问题（农业，农村，农民）极为重要。1995年以来，总共有2亿农民进入城市。据估算，居住在城市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城市化率）在2003年超过了40.0%，去年达到了46.6%。但农业人口仍然占总人口的一半多，因此，提高农业人口的收入和农民的购买力，能使家电和汽车等耐用消费品的销量提升。作为拥有世界最多人口的国家，如果中国的农村人口的可支配收入大幅度增加，那就很有可能成为消费大国。

第三是要以世界经济危机为契机，精心进行产业结构调整。由于世界经济危机导致经济低迷，以美国为中心的西方国家的国内市场正在萎缩，导致中国出口减少。中国的制造业中有很多是贴牌生产，由于国外订单的减少，一些企业陷入破产或关闭的局面，几个月内就有几千万人失业，使中国的失业问题进一步恶化。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从外国引进了大量劳动密集型产业企业。另一方面，国内的乡镇企业和中小型企业也成长起来。今后应当在重点扶植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企业的同时，对国内的产业结构进行调整，使产业结构高端化。并要开发高附加值的产品，开拓新的国内市场。与此同时，还应进一步开拓国内的消费市场来拉动内需。

第四是改变购买美国国债的政策。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却在大量购买经济超级大国美国的债券，这让人感到惊讶。长期的对美贸易顺差，为防止人民币升值过快而购买美元，预计人民币升值而大量流入中国的“热钱”和世界各国的对华直接投资使中国货币储备激增，成为世界上外汇储备最多的国家，也是持有美国国债最多的国家（截至2009年6月底为7764亿美元）。中国2.4543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中，美元占70%左右。美元的大幅下调将会给中国带来巨大的损失。美国国债由于利息较高，对于中国来说十分有吸引力。但是一旦其利息下降，中国就会蒙受巨额损失。中国政府眼下正在削减外汇储备中美元的比例，转向“一篮子货币”方向，同时，也开始积极地购买了日本，韩国，中东各国和希腊的国债。

第五是确保资源。为了实现长期快速的经济的发展，中国需要更多工业原料和农业原料。同时还需要确保足够的天然资源。中国的举措有促进和世界各国的贸易，促进和东南亚各国的紧密贸易合作，与东盟10国签署“中国东盟FTA”，召开中非会议加强与非洲的合作以及通过上海合作组织与俄罗斯和中亚各国加强经济合作和确保自然资源等。在南海，中国还要考虑搁置领海争议共同开发资源的解决方案。中国已经从石油出口国变成了进口国，为了保持可持续的经济发展，必须确保长期的资源来源。

第六是人民币汇率上涨。人民币的汇率变动正在得到世界的关注。尽管人民币没有和美元挂钩，但其变动幅度被限制在一定范围内。由于欧美日的压力，中国于2005年7月21日调整了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距上次调整已有11年半时间。1美元对8.27人民币的汇率调整为对8.11人民币，涨幅仅为2%。之后人民币一直逐渐上升，截至2010年9月21日为6.6人民币。也就是说，从2005年到现在，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上升了20%。欧美日从几年前开始就一直主张人民币的价值被低估了30%到40%，尤其美国政府首脑和高级官员会在各种场合要求人民币汇率上调。但中国一直坚持认为人民币汇率变动是中国的内政，应由中国政府根据国内外经济状况进行判断和裁定，不应被外国所左右。欧美日的意图是通过人民币的大幅上涨来缓和本国的对华贸易逆差。尤其美国的这一愿望更加强烈。但是，除非人民币的汇率上调幅度极大，否则美国的对华贸易逆差不会得到有效改善。而人民币汇率大幅上涨可能导致出口相关制造业企业大量破产，如果中国对美出口大量减少，对于美国的普通消费者也是不利的。总之，虽然人民币汇率上调是

国际经济的大势所向，但由于中国政府的判断，不可能在短期内有大幅度上调。

美国把人民币不进行大幅度上调的行为视为中国对对外贸易的补贴，还认为如果不抑制中国对美国的出口，就不可能改善对华贸易逆差。尽管美国已经多方施加压力，但由于人民币汇率没有上调至美国所期待的水平，美国正在通过法案来进一步施加压力。2010年9月24日，美国参议院财政委员会以压倒性多数通过了对华贸易制裁法案。这一法案是否会在众议院获得通过，值得人们瞩目。

第七是走 G2，G8 还是 G20 的道路。去年，美国提出了 G2 构想，即美中两国保持长期合作，解决各种国际问题。中国对此进行了认真并且积极的探讨，一度流露出合作的姿态，但最终没有同意这一构想。假如中国同意这一构想，那么必定会马上被周边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所孤立。

另一方面，中国没有参加 G8 会议。2010年6月25日的峰会上，首次参加峰会的日本首相菅直人建议邀请中国成为 G8 的新会员国，但中国立即回绝了这一邀请，重申了重视 G20 的立场。G8 的其他成员国面对菅直人突如其来的建议，表示“(G8) 作为拥有共同价值观的国家坦诚交换意见，确定未来发展方向的平台仍然十分有用”，也拒绝了这一建议。中国一直坚持参加 G20，如果加入 G8，就会在外交，安全保障等方面受到诸多限制。作为金砖四国的一员，对于中国来说和 G8 一起加入 G20，以此发挥在国际舞台上的作用（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是更好的做法。通过参加 G20，中国在国际上的发言权得到了提升，作为 G20 的主要成员，中国也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亚洲发展银行等国际机构里发挥了积极的作用。预计今后中国仍将会保持这一姿态来参与国际事务。

（四）代结语

由于中国经济的发展一直依赖于西方国家市场，因此无法避免源于美国的金融危机和世界金融危机带来的负面影响。在金融危机发生之后，中国通过大型财政支出计划来扩大内需和刺激国内经济。之后由于中国的经济恢复得较快，国际社会也进一步期待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作用。

中国大量购买了美国国债和股票，也开始购买日本和韩国等国的国债。由于人民币和马来西亚货币已开始自由汇兑，中国货币的国际化也进入到了人们的视线当中。在国际金融市场上，中国的作用也会越来越大。

中国还增加了在各个国际机构里的出资。在资金运作上则极力避免美元变动带来的影响和冲击。最近，中国提出不应把美元作为唯一的国际基准货币，建议在 IMF 中应当使用“Special Drawing Rights (SRD, 特别提款权)”。中国的建议得到了世界的关注，但最终未能实行。这是因为美国仍然希望美元能够作为国际基准货币流通。

同时，在东亚共同体的建设上，中国主要致力于通过签署 FTA 和 EPA，进行区域经济合作（国际贸易，海外直接投资，技术转让等），实现经济发展。为了促进东亚各国的外汇改革，也由于 1997-1998 年的亚洲经济危机和 2008 年美国金融危机带来的教训，东亚各国开始摆脱把美元作为基准货币的局面，转而提倡更多使用东亚各国的货币。ADB (Asian Development Bank 亚洲开发银行) 倡导的 ACU (Asian Currency Unit 亚洲货币单位) 也成为了东亚各国会议上的议题。一般认为，想在东亚实现欧元那样的单一统一货币，需要很长时间。但在这一区域内增多区域各国货币的使用是完全可能的。比如，人民币不仅在香港和澳门，在与中国接壤的国家也得到了使用（边境贸易中）。另外，2010年8月19日开始，上海外汇市场

启动了人民币和马来西亚货币的自由交易。可以说东亚已经逐渐摆脱了变动剧烈的美国货币和美国金融体制。

参考文献

- 林华生,《东亚经济圈》(增订版),世界知识出版社,北京,2005.9
Lim Hua Sing, "Japan & China In East Asian Integration",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Singapore, 2008
林华生,滨胜彦,澁谷祐 编著《亚洲经济发展的阿喀琉斯之踵—资源枯竭和环境破坏—》,文真堂,东京,2008
林华生,滨胜彦,澁谷祐 编著《考问日中印的真正实力 围绕着经济危机》,白帝社,东京,2010
-

以下是黄枝连教授对〈中國經濟發展与世界金融危机〉一文的讀后評論。

日本早稻田大學教授暨中華經濟研究所所長

林華生兄：

感謝賜寄大作；我不是經濟學者；但，從其他社會科學的觀點，對大作細心閱讀后，可以寫幾點讀后感：

- [1] 中國過去 32 年的高速成長，援用“西方模式：美國模式-日本模式”的程度顯然很高；但，它的“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已然是一個現實；它當然也能發生其應有的作用。因此，改革開放后，即使是市場經濟和參加 WTO，它也不可能“西方化：日本化-美國化”。

正因為如此，它受到 1997 年和 2009-2010 年的西方經濟危機的沖擊，雖然大，但未遭遇到重創；因為，它並不是「或，未曾是」西方經濟主導的國際經濟體系「即，所謂全球化」的一個密切的組成部份。

- [2] 確如大作指出，因中國經濟用上了西方模式，如，集內外重資和發展要素，在城市和沿海做集中的發展，出現高成長；也就出現了炒股和炒地產的現象，隨時因蹈日美后塵而有泡沫化之虞。

所以，中國經濟如果住“三農”和中西部開發尋求發展，對差異性因素做多元化處理，或可脫圍而出。

- [3] 結合近日發表的中共十七大五中全公報，如果，中國能從根本上逐步重組-改變其發展模式，亟需引進許多“逆向發展”的策略，便可及于改變對歐美市場及歐美投資的過度依賴。

那麼，它對美國國債的購買及美中經濟的關係型態，也可以改變；使兩國的經濟摩擦減少。

可以預期，中國對美國的經濟依賴程度，會逐漸地減少；十年八年后，在質量和形式上，都要有新型態。

否則，美中經濟關係如昔日的美日經濟關係，糾纏不清；影響著其他方面的中美關係和中歐關係；對兩者及第三者都不利。

- [4] 如果，中國發展模式能因應內外形勢，及早地大大改變，包括參與全球經濟治理；它便得在 G2, G8, G20, “金磚四國”「或，包括南非和印尼在內的“金磚六國”」之類的框架里，扮演一個積極性的“典範轉移-體制創新”的角色。

這包括，對從外貿出超和 FDI 中取得大量外幣儲存的政策，予以改變；或者說，能善用從國際上取得的巨額外匯，對內部發展和外部政策，發揮更大的開發性作用。

顯然，對國際事物的參與，有政治範式的轉移，也有經濟範式的轉移問題。

如此，中國在世界大局的開拓上，才能居於一種比較主動-有所做為的地位。

- [5] 見之于諾貝爾經濟學獎，西方模式和西方經濟學是這几百年來的國際現實及其主流；几十年前的說法是，“資產階級經濟學”。故，必須逐漸地從詞彙，概念，理論，模式，方法論等方面，讓它演變；在三十几年后，可以有另一種經濟學和經濟發展的理論。

否則，中國和印度等發展中國家的高速發展是會不時地遭遇到“老師討學生便宜”的種種危機沖擊而泡沫化的。如果還能有什么新興經濟體，便會繼續地同西方國家糾纏不清，以致于受后者的操控和干擾的。

- [6] 大作第一段便涉及所謂“亞洲華人經濟”以及新加坡的華商和政府合作在中國各地建立“小新加坡式城市建設”；顯示，它們意識到，在沿海城市搞房地產炒作，不會是財源廣進之道。

其實，這一點說明了，華商和新加坡政府已意識到“發展模式轉變”的重要性。

澳門大學出版社可能為我出版的兩本“華人華僑-經濟中華-華夏體系”論文集，使有此一論：生產方式-發展模式的演變和轉變，決定華人華僑和居住地及其祖國（祖籍國）的關係型態；而進入二十一世紀，因應“中國經濟-中華經濟”的突飛猛進，“華人華僑-經濟中華”在“中國發展-中華範式”開發開展中，需要出之以新的關係型態...

- [7] 如果，“模式範式-關係型態”要根本地改變，則中國經濟在“世界工廠”和“世界市場”上，倒不必有〔不需要是〕一個取捨的問題；而是兩者並舉的雙軌交通吧。

這種有創意-有效益的轉變，則得花開又一枝，增加向本國“三農”和弱勢群體-弱勢產業-弱勢地區的大事轉向-轉移-轉化；從中“優化舊產業-開發新產業”〔如，“風能產業”和我几天前在上海同陸緋雲與張雄及王戰等教授提及的，同高齡人士-銀髮人士及其生存發展相關的“重陽計劃-三銀工程”……〕；因而取得差異化-優質化的可持續發展；而中國發展中的種種問題，也有可能得到化解，取得科學發展與和諧社會。

總之，中國和非西方國家的發展和可持續發展，決定於一個“后西方主義-后資本主義-后社會主義-后馬克思主義”模式的探索和開發；而“中國發展-中華範式”是否能成事，要三幾十年後才有定論吧。

- [8] 未來，中國政治經濟的高速發展-持續發展對國際社會的意義與作用，可能也在于，它對外國〔特別是發展中國家〕的弱勢群體-弱勢產業-弱勢地區，能予以支援；而從中尋找發展空間；引發交流協作。

即，我在閣下為之撰寫序文的拙作《東亞發展的典範轉移：探索中國走向二十一世紀的天路歷程》（澳門大學出版社將於今年12月出版）中，把它概括為“x: x (1, 2, 3, 4)”。

即，中國的發展，不可能只是向西歐和北美的市場尋找利益。

其實，中國經濟的高速度和可持續發展，也取決於，它對西方國家的弱勢群體-弱勢產業-弱勢地區的發展模式的轉變，也能發生某種“典範轉移-體制創新”的“外因作用”。有此“外因”，前者的“內因”便可以發生更大的作用。

即，“中國發展-中華範式”必須在境內外-國內外-上中下的“弱勢環節”間找尋發展的空間-動機-動力；所以，中國經濟如何改造並建設“世界工廠-世界市場”這麼一個“雙引擎-多平台”的模式，是一個世界性的挑戰。

如果成功，對中國固然重要，還可以引發另一波的全球化和區域協作呢。

以上是我這些年來的讀書和研究的一點心得；從大作中可以得到強化和優化；因此，要謝謝你的促進作用呢。

黃枝連啟

2010年10月22日上午

.....